

互联网时代的个体自由与孤独

——社会理论的视角

王建民

摘 要 作为现代性后果的互联网“脱魅机制”，延续了现代性的个人与社会、自由与束缚、个体自治与个性规避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的后果之一就是个体难以名状的孤独感。孤独感源于个性与意义的双重缺失。互联网增进了个体获得和传播信息的便利性，但也使个性淹没在繁芜庞杂的信息中。互联网给个体带来暂时的“去权威化”体验，也使其陷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社会联系的意义上，互联网促进了个体之间的“在线交往”，但常常削减了面对面交往中的人性因素，制造或加深了个体的孤独感。对于互联网时代的个体来说，在参与社会生活的同时培育自我反思能力和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化解孤独感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互联网时代 “脱魅机制” 自由 孤独 社会学的想象力

互联网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和后工业社会的象征。进入 21 世纪以来，互联网的发展日新月异，对人们工作方式、交往方式、学习方式的影响越来越大。互联网提高了办事效率，也扩展了人们的想象空间。加上与移动通讯相结合，互联网简直就像“幽灵”一般如影随形，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须臾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不过，当人们为互联网时代的来临而欢呼之时，批判和反思之声也不绝于耳。这不仅是因为互联网的兴起挑战了既有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因为它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使人在享受它的便捷高效之时，也受制于此甚至深受其害。

一、作为现代性后果的互联网

如果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现代性的重要构成要素，那么，体现科学技术当代发展的互联网便是现代

性的重要成果。而且，和以往的科技产品相比，互联网对个体生活的影响更为直接而明显。从网络搜索到网络社交，从网络办公到网络购物，互联网已深深介入甚至重构其使用者的日常生活。如果我们把互联网的兴起纳入现代性的发展轨迹中，便会发现，互联网的兴起及其后果依然延续了现代性的个人与社会、自由与束缚、个体自治与个性规避之间的张力。对此，我们可以在社会理论的意义之上分析互联网的兴起及其现代性意涵。

在西方语境下，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推动了现代社会和个人的诞生。然而，这三种力量在助推现代性发育的同时，也制造了现代性的矛盾性。宗教改革的后果是：一方面，强调了个体的信仰自由，为近代个人主义奠定了基础，但也导致个体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增加；另一方面，新教肯定了世俗价值和追求财富的正当性，但也造成了马克斯·韦

伯所担忧的“狭隘的专家没有头脑,寻欢作乐者没有心肝”^①。工业革命使人挣脱了传统的束缚,增强了挑战自然的能力,但随着传统世界的“脱魅”(disenchantment)和工具理性的泛滥,个体变得愈发孤立,生命的意义不断被消解在技术、机器、商品和金钱之中;人类物质生活越来越丰裕,但精神家园却日渐荒芜。启蒙运动进一步解放了人的理性,但并没有开出遏制理性疯癫的药方,系统殖民了生活世界,科学现代性压倒了人文现代性。

上述问题或可称为“现代性的危机”。在诸多现代性危机中,最为核心的也许就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体自由与社会团结的矛盾。前者体现为传统的宗教和形而上学价值在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中日渐衰微,个体开始直面寻找生命意义的难题,而科学话语所提供的解释模式又无法满足个体的意义寻求;后者体现为个体自由从传统权威的束缚中释放出来,但个体对社会的离心力也在同步生长,随之而来的个体孤独、焦虑,又催生了其对社会团结甚或对新权威的渴求。这种现代性的危机一直困扰着现代人和以重建“社会”为己任的社会理论家。

现代性的悖论在互联网时代依然延续,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人们借助互联网提高了学习、生活和工作效率,体验到越来越多的个体自由,但对互联网的依赖和被束缚感也与日俱增;过于依赖网络信息和技术逻辑也导致个性的消弭,获取信息本身成为目的,而不是发展个性的手段。另一方面,互联网促进了“在线交往”,扩大了人际交往平台,使联系“无处不在”,但也削减了面对面交往的可能性,使离群索居者越来越多,造成个体与社会的疏离;缺乏心灵交流和真诚原则的网络交往,常常使交往流于表面,由此加剧了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孤独感。

互联网究竟具有怎样的“魔力”,使个体处在这种悖论之中?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种悖论以及其中的个体境遇?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互联网的理性化特征谈起。在互联网的便捷、高效、程序化的意义上,它体现了美国学者乔治·里茨尔所言的“社会的麦当劳化”(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特征,主要是效率(efficiency)、可计算性(calculability)、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和可控制性(control)。在里茨尔看来,社会麦当劳化的理性化原则及其不合理性已经蔓延到高等教育、医疗、旅游等领

域,甚至人的出生和死亡也被麦当劳化了。对此,里茨尔呼吁:“我希望人们可以抵御麦当劳化,并且创造出一个更合乎人的理性和更加人性的世界。”^②

效率、可预测性、可计算性和可控制性等理性化特征,也在互联网上体现出来。首先,毫无疑问,互联网为使用者带来了效率,无论在个人信息的存储、传播、修改上,还是就多人在线交换信息而言,互联网跨越了空间、压缩了时间;其次,可预测性意味着,只要能接入互联网,网民就可以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打开相同的网页,只要上网设备和网络服务器运转正常,网络信息就会“如约守候”;再次,可计算性体现在,点击率、排行榜攫取了网民的注意力,一如消费者在网购时经常被商品的成交量所吸引,以至于有时点击率、排行榜、成交量淡化了人对商品质量的了解和关注;最后,可控制性是指以非人的技术代替人,网民只需点击键盘或滑动屏幕,输入网址或搜索关键词,网页就会自动弹出,一切都交给机器,人需要做的只是眼盯屏幕、移动鼠标、选择网页、复制粘贴等。我们将这四个特征称为互联网的“脱魅机制”。

互联网的理性化特征同样包含了不合理性。例如,互联网提高了办事效率,但也使人卷入浩繁的信息中;重复性信息大量存在,而且信息的来源、真伪难以辨识;网络在线模糊了人对时间的感知,使人不经意间虚度时光。这些都意味着效率的降低。可预测性往往意味着重复性和单调,并由此带来无聊。可计算性遮蔽了人对“量”背后的“质”的识别,阻碍了对“质”的探究。可控制性的消极后果是,将人交给机器,网民上网看似是自主的活动,但只能顺应电脑和互联网的技术逻辑,甚至在线交往也沦为人和机器的对话。无效率、单调、对“质”的忽视、非人性这些不合理性表明,作为人的理性成就的互联网,与很多科技产品一样,成为对个体自由的限制和束缚。

在了解了互联网的理性化特征和不合理性之后,下文具体从信息获得中的个体自由及其限制、“在线交往”中的个体孤独两个方面,分析互联网对个体生活所带来的矛盾性影响。

①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苏国勋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页。

② 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顾建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页。

二、信息获得中的个体自由及其限制

互联网时代意味着个体的崛起和个体自由的增加。在信息获取和传播的意义上,互联网扩展了人的身体所能感知和触及的范围,将麦克卢汉所说的“人的延伸”^①再次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受物理时空限制的身体,使以往的“耳听为真、眼见为实”变成页面变换和转载搜索,而页面变换和转载搜索的速度为以往任何传播媒介所不及。个体的“自由”还体现在,即便是一个年少轻狂、阅历单薄、学识有限的人,也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以往更多地依赖师长、书本、社区、权威机构等才能获得的知识与信息,而且越是年轻一代,适应和使用互联网的能力就越强。此外,互联网是一个“脱魅”的世界,“网”里没有现实生活中的复杂习俗和规矩,个体上网意味着暂时“脱离”很多社会规范的约束,甚至会体验到一种“漂浮”于社会规范之外的自由感^②。

不过,互联网在使个人体验到自由的同时,也带来对个体自由的束缚,这至少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繁芜庞杂的海量信息制约了个体的智识能力。个体凭借互联网似乎可以“通晓”一切,然而,这种“通晓”不是存在“人脑”中,而是存在“电脑”中。当网络切断、电脑(或其他上网设备)关闭,刚刚还是博通古今,可能马上就变得孤陋寡闻。因此,互联网对身体的延伸,并不意味着对人的智识能力的延伸,甚至可能相反。信息越多、越庞杂,属于个人自己的信息就越少。虽然互联网上的信息是无数个体创造的产物,但这些信息一经产生和汇聚,便远远超出了个体所能掌控的范围,这是一种齐美尔社会理论意义上的“more—life”与“more—than—life”的矛盾。

第二,互联网的技术逻辑限制了个性发挥的可能性。在人们享受敲击键盘、转载搜索、收发信息所带来的快感时,其实已陷入一种悖论:海量信息瞬间可得,但往往千篇一律,以至于信息越多,有价值的信息越少。可以说,“贫困是分等级的,而键盘是讲民主的”^③。在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意义上,任何人都需要按照互联网本身的技术逻辑行事,而互联网的技术逻辑指向的是无数个虽然性情不同但都叫

做“网民”的个体。因此,人们利用互联网“自由地”获取信息,实际上是在互联网的技术逻辑中不自觉地规避自己的个性,或者说,人的个性在键盘和屏幕面前难以发挥。而规避个性本身乃是对自由的最大威胁,因为没有个性,也就没有对自由的独立体认,难有真正的自由可言。

第三,依赖于互联网获得知识削减了知识获得中的思维过程和丰富体验。互联网提供的海量信息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工作与学习,这在表面上简化了原有的更多地通过人工获得资料的复杂程序,实际上却让人们失去了整理、加工资料所带来的过程感;简单的键盘敲击、复制粘贴取代了用笔尖勾画文字,甚至知识的内化在这一过程中都变得不再重要了。如此一来,信息可获得程度的提高并不意味着知识的增长与人格的升华,反而助长了浅尝辄止的习惯和不求甚解的风气。

第四,网络交往将个体束缚在静态的空间中并钝化对他人与社会的感知。互联网在“解放”身体的同时,也导致身体对互联网依赖的增加。早在1998年中国互联网刚起步之时,便有论者敏锐地指出:“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与他人和世界交往的时代,因而是一个最大限度地限制我们与他人和世界直接交往的时代——它使我们不出门而知天下事,使我们‘坐地日行八万里’,它通过这种方式把我们软禁在家里。人与人的交往简化和抽象成‘机’与‘机’的交往。”^④在人际交往的意义上,套用马克思的话说,“机器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人的东西成为机器的东西。”

第五,个体对互联网“抽象权威”的依赖。互联网一方面推动了传统的“脱魅”,抹平了地方性知识,进一步消解了集体意识,这是一种“去权威化”过程;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众多个体所追求和依赖的新权威——“抽象权威”。其“抽象”体现在,互联网中没

① 参见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② 本文使用的“自由”概念不是政治权利意义上的liberty,而主要指个体相对于外在环境和规范而言的自由(freedom)的增加。

③ 这里套用了乌尔里希·贝克的一句话“贫困是分等级的,烟雾是讲民主的”(乌尔里希·贝克、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路国林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页)。

④ 吴伯凡:《孤独的狂欢——数字时代的交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345页。

有明确的指导中心,没有明确的指导者或领袖,也没有稳固的规则或共识性意见。其“权威”体现在,使用互联网者,常常将搜索引擎作为获得知识的工具,希望在互联网中寻找顾问、指导性意见甚至具体的行事规则。不过,互联网却难以为个体提供这样的指导,因为,虽然它汇聚了数量庞大的信息,但信息的内容往往泥沙俱下,难以识别,反而掩盖了信息中的思想含量。因此,互联网的“抽象权威”至多带来“权威”的假相,难以提供权威性指导,也无法建构独立自由的个体。

第六,互联网大众文化对个性的吸纳。互联网时代也是大众文化时代,个性往往成了对流行文化的模仿,而不是个体内在生命特质的显现。大众文化席卷了网络所覆盖的各个领域,各种广告、标题、小道消息弥漫在无数个网页上。对个体而言,他所面对的是庞大的网络信息以及网站的单向信息灌输力量。个体网民的选择只是浏览和参与哪个网站,但无法决定网站本身的技术逻辑。只要投身于互联网中,每天都有大量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左派的或右派的、自由的或保守的信息在冲击着人的思维,不断挤压个体的独立思考空间。在互联网与大众文化交织的社会中,窥私、猎奇、性与绯闻等成为永恒的兴奋点,个体之间交流的内容往往不是各自的生命体验,而是互联网上的奇闻异事。在这个意义上,人成了互联网的传播媒介而不是相反,二者的关系颠倒了!

如果再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在个体自由的限制与个体孤独感之间存在逻辑关联。这里,我们姑且将孤独感理解为个体与他人和社会的疏离感,包括孤单、无助、苦闷无告等心态。真正的个体自由的要义是个体的自立自决而不是依赖身外的力量,表现为个体感知到自我生命的充实和完整。依赖于外在的技术力量遮蔽和限制了个体的自由,自然也无法带来真正的充实感和完整感。在网络依赖中,化解孤独感的方式往往是诉诸更多的网络活动,这进一步造成孤独感的循环往复。那么,个体的孤独感如何排解呢?在面对面交往缩减的情况下,“在线交往”能担当此重任吗?

三、“网络社区”中的个体孤独

与以往的科学技术相比,互联网的一个独特影

响是推动了社会生活的个体化。也就是说,虽然网络空间中的活动有多人参与,但在现实生活中,网民往往是独自一人面对电脑屏幕,线下的孤独与在线的热闹相伴而生。除了日常工作之外,上网更多地被网民当作休闲娱乐的手段,如收听网络音乐、观看视频电影、打网络游戏等,但这种休闲和娱乐往往只是“一个人的舞蹈”或“孤独的狂欢”。而且,互联网的很多娱乐产品往往千篇一律,不会关照到性情殊异的个体,所以,对互联网的依赖越多,越难以满足个体寻求自我和生命意义的人性冲动,也难以体验到与他人的深度连结。

网络聊天工具和社交网站为在线交流提供了平台,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使用者之间的交流更加便捷高效,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个体排遣孤独感的心理需求。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就像雪莉·图克尔在《一起孤独》一书中所言,我们从未在如此多的时间内与如此多的人保持联系,但我们也从未如此孤独,我们好像是一个陌生人处于一个陌生的世界,“数字化联系和社交机器人(sociable robot)可能提供了伙伴关系的幻觉,其中没有对友谊的需要。我们的网络化生活使我们即使在相互连接时也彼此逃避”^①。图克尔警告说,接纳此类技术关系以替代持久的情感联系是极其危险的。

在笔者看来,或可将与互联网相关的孤独分为两种。一是互联网制造了孤独,即人们本来并不那么孤独,但对互联网的使用和依赖削减了面对面交往,使人产生了空虚孤独之感;同时,互联网的工具理性特征,也容易使人产生孤独感。二是在高度复杂的社会中,个体越来越孤独,孤独的个体试图通过互联网化解孤独;不过,互联网暂时满足了个体的感官体验,却无法化解孤独的根源,而对互联网的依赖反而强化了原有的孤独感。当然,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难以明确区分的。

先讨论第一种孤独,即依赖互联网所产生的孤独。在“网络社区”中,个体与社会的疏离表面上被互联网所消弭,似乎人与人的连结更加紧密,但实际上,个体之间通过网络媒介连结,并不意味着社会性的

^① Turkle Sherry,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2, p. 1.

生成,反而会使个体因为使用互联网而变得孤独。这是因为,一方面,网络交往削减了日常生活中的面对面交往,使社会生活越来越个体化;人对电脑、手机、互联网的兴趣侵蚀着与友人面对面交往的兴趣,虽然个人的网友众多,但常常处于离群索居的状态。正如图克尔所言,“我们上网是因为我们繁忙,但结果是花在技术上的时间更多,而花在彼此之间的时间更少。我们将连接作为保持亲近的方式,实际上我们在彼此躲避。”^①

另一方面,在线(online)不是能动的生命意义上的存在(being),而更多的是互联网及其背后的技术理性对人的注意力的转移和分散。即便在线交流可以表达交往双方的情感,但这种情感必须通过电子设备和网络符号进行,而电子设备和网络符号无法真正体现出人的言谈举止和喜怒哀乐,就好比使用书面文字无法传达面对面交流中的感知和意会一样。电子设备和互联网符号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使媒介的工具性遮蔽了媒介背后的人的情感和意志,进而削减了交往中的人性因素。在线信息无法传递信息发出者的情感的微妙性,若深入理解其所想所思,势必要加入想象、揣测甚至怀疑的成分,从而降低了交往的质量。如此一来,在线交流很可能会流于表面化。因此,即便网上的朋友遍天下,电脑屏幕前的个体却往往依然形单影只、孤独难诉。

再说第二种孤独,即通过互联网化解孤独所滋生的孤独。以社交网站为例,其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局限性。其一,社交网站具有娱乐化倾向,同其他娱乐方式一样,主要带来感官的刺激和体验,而非深度意义的获得。其二,社交网站的参与者必须要有“新鲜事”才会引起足够的关注,这使信息发布者刻意标新立异,甚至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而一个事件被关注后,又激发了继续被关注的冲动,使得“标新立异”成为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其三,社交网站中的个体追求网络空间的被访问次数、日志的点击率和被分享的次数,而迅速的信息更新总是淹没已有信息,使信息发布者的愉悦体验转瞬即逝。其四,在社交网站中,转载、分享者多,而原创、深思者少;转载、分享的越多,属于自己的思考就越少。因此,社交网站难以满足个体的个性需求,却可能使人耽溺于一次次短暂的新奇体验中,而每次体验结束之后,又是对尚未发生的体验的渴望。然而,

对新奇体验的渴望常在,但新奇体验未必常有,结果要么是无聊,要么是孤独,其共性是无意义感。

我们可以区分网络交往中的两种关系:熟人关系与陌生人关系。一方面,社交网站的参与者是现实生活中的熟人,互联网使熟人之间的联系更加方便,但如前所述,方便之余,反而减少了面对面交往的机会,或者彼此之间的问候仅仅变成网络留言,减少了交往中的人性因素。另一方面,社交网站也使一些陌生人建立联系,或者是熟人推荐,或者是网络偶遇,但这种联系并没有深厚的现实基础,也难以形成深入的心灵沟通。即便这两类关系在化解个体孤独感上有积极意义,但却增加了个体的在线时间和在线期待,造成了对现实社会活动的排挤,而这恰恰是个体孤独感的重要根源。

社交网站在制造短暂的“伪集体欢腾”(false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之后,又将个体重新推向空虚和孤独。这是社交网站甚至整个互联网时代个体的言说状态——人人渴望诉说,却没有人愿意认真倾听。在众声喧哗的网络空间中,人人渴望制造更高分贝的音调,或努力在喧哗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但谁会愿意用心倾听一个孤独者的私语?当个人通过互联网将内心情感表达出来,经过苦苦等待却发现无人对自己的心声给予关注,失落感和孤独感将由此滋生。

诚然,互联网可以提供一个在现实中很难获得的公共空间(除了社交网站外,还包括各种论坛、贴吧),让各种话题汇聚其中,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个人疏泄苦闷的渠道。不过,互联网的公共议题和生活世界的公共议题是有区别的。日常生活中人们谈论的往往是与个体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而在互联网上,往往是那些奇闻异事才能吸引网民的眼球,但实际上,这些话题和个体网民的日常生活可能并无直接关系。网络话题与现实话题的分离的另一重要后果是生活世界被互联网侵蚀,也就是说,当网络议题渗透到大众生活中时,人们往往习惯于认为谈论网络话题、使用网络话语是一种时尚,由于这种时尚的成本不高,加之群体压力的作用,互联网话语的现

^① Turkle Sherry,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2, p. 281.

实影响力便不断被强化,而真正重要的现实话题渐渐被网络话题取代。

不可否认,互联网确实社会压力日增的氛围中满足了一些人的减压需求。但是,互联网往往掩盖了或暂时吸纳了个体的孤独感,而没有也无法化解造成孤独感的深层社会根源。在某种意义上,在线依赖的背后是大卫·理斯曼(David Riesman)所言的“他人导向人格”。“‘他人导向’概念意味着过分重视他人(或大众传媒代理人)……对于他人导向者而言,行动的方向和行动的选择要视他人的态度而定”^①。这样,个体对“在线”的依赖越多,可能变得越孤独,进而,对“在世”和深度意义的需要也就越多。因此,个体对日常的面对面交往及其意义的依赖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互联网延续了现代性的悖论:个体似乎自由地“畅游”在互联网中,实际上却陷入米兰·昆德拉所言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或许,互联网也像韦伯所言的科层制那样,是现代人不不得钻进去的“铁笼”,难以逃脱。那么,我们真的无能为力吗?

四、重申“社会学的想象力”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很多问题,实质上早已经被经典社会理论家们讨论过了,尽管问题的背景和提法不尽相同。如果说互联网时代的个体境遇与涂尔干、韦伯、托克维尔等社会学家生活时代的个体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个体在摆脱传统习惯、集体意识束缚的过程中获得更多自由,但同时,个体的安全感也面临威胁,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连结发生故障。这是涂尔干所言的“失范”状态,即“社会在个体身上的不充分在场”或“社会的缺席”。这一问题同样在互联网时代表现出来。

互联网时代个体所面临的重要难题是:个体获得更多自由,但又陷入孤独和与社会的疏离;个体试图摆脱孤独,却因为无法表达自己的孤独而变得更加孤独。“无法表达自己的孤独”有两种,一是不知如何表达或无能力表达,二是人人都在表达,但却没有人认真倾听,因而其孤独也就无法被理解。在互联网社会中,一方面,个体面临前所未有的表达空间,却往往不知从何说起,难以表达自己的感受;表

达者用尽文字、图片、符号,接收者却难以感同身受。另一方面,制造网络喧哗者众,而认真倾听者少;以寻求理解为目的的表达越多,被理解的可能性反而越少。正如社会行动的中介化(行动者之间的距离拉大)会削弱个体对他人的同情心和道德意识^②,社会交流的中介化也会弱化交流双方对彼此情绪、情感的感受和体认。

这种难以言说的孤独,就像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所言的焦虑状态:“我们的时代是焦虑与淡漠的时代,但尚未以合适方式表述明确,以使理性和感受力发挥作用……人们往往只是沮丧地觉得似乎一切都有点不对劲,但不能把它表达为明确的论题”^③。米尔斯呼唤一种作为心智品质和洞察能力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以使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看清世事。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人能够看清更广阔的历史舞台,能看到在杂乱无章的日常经历中,个人常常是怎样错误地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无疑,社会学想象力的培育,需要个体在实践层面走出离群索居的生活,参与公共事务,以此化解个体生活中难以言说的各种困扰,而社会学家则更需要具有实践精神、公共视野和批判态度,也可以说,培育社会学的想象力是社会学的重要学术使命。

除了参与公共生活和社会交往之外,个体更需要有能力在独处之时感知生命的充实,即心灵的充盈感,所谓独处而不孤独;个体需要在阅读和思考中丰富自己的心灵,并通过永无止境的自我反思化解孤独。总而言之,在喧嚣的互联网时代,只有建基于“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个体生活”才具有根本意义。

(本文作者:王建民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献忠

① 大卫·理斯曼:《孤独的人群》序言,王崑、朱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4页。

② 参见米尔格拉姆《对权威的服从》第四章,赵萍萍、王利群译,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220页。

③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页。